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汪敬虞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汪敬虞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952-5

I. 汪… II. 中… III. ①汪敬虞-文集②资本主义-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IV. F1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060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郭娟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354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前 言

著者从事研究工作将近 60 年。在漫长的岁月中，具体研究课题虽多有变动，但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总的研究方向。因此，本书集中选录了这方面的有关论文。它不仅对著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这些论文的汇编，也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涉及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问题的方方面面，反映了著者个人所能达到的研究水平。

本书共收录论文 19 篇。其中多数为著者近 20 年中的作品。这是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学术界曾多次举行的有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问题的学术讨论，与著者的长期研究密切相关。为此著者曾撰文多篇，参与讨论。更重要的是，从 80 年代末起，著者开始承担了“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年）》的主编工作。在集体编写的过程中，为了使参加课题组的全体同仁对这段历史有基本一致的共识，著者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在经济研究所内外开展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为此著者又发表了有关“中心线索”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因此汇集在本书内的论文，可以说凝聚了著者毕生、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的研究精力。此外，本书也有选择地收集了著者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以及 1949

年以前的少量作品，其中1949年以前的，只选了一篇：即《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该文曾在国外发表，国内甚少流传。由于这些文章和80年代入选的文章在内容上基本一致，而且文章本身保留了一些值得继续研究的资料，所以加以选录，以观全豹。

所有这些论文，按内容的性质分为两大类：一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即本书的第一部分，共10篇；一是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即本书的第二部分，共9篇。不言而喻，这种归类，只能是相对的。因为许多文章的内容，是二者兼而有之，不能截然划分。不过大体分成两类，有利于眉目的比较清晰。至于每一大类中的论文，也有不同的考察角度和重点。但在此一层次上，归类更为棘手。因此不再细分，基本上按文章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以便读者了解著者的思路脉络。但第二部分中有些文章，性质相近，而发表时间先后参差，检阅不便，就集中一处，形成一个重点。灵活处理，也许更便于读者的审阅。

本书所收论文，一律保留原来的结构和论点，只作文字上的订正和个别史实的补充。各篇内容，难免有所重复。所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衷心感谢院领导对本院老龄学者的关怀和科研局对《学者文选》组织工作的重视；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学者文选》出版的积极安排。

汪敬虞

目 录

前言.....	(1)
试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1)
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产生问题的讨论	
——续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25)
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	
——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41)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72)
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95)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120)
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	(148)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	(167)
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188)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	(211)
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	(235)
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	(263)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地区研究一例 ——建省前后的台湾经济·····	(280)
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制茶业中资本主义企业 的产生·····	(309)
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和缫丝业中资本主义企业 的产生·····	(340)
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367)
从继昌隆缫丝厂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399)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420)
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特征·····	(441)
 作者著译书目·····	 (465)
作者年表·····	(467)

试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关于辛亥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整个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要使这一研究富有成果，就需要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资产阶级的产生，严格地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式确立之后。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过去有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对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市民等级，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是否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以后。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 本文系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而作。

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城市 工商行业的变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城市的工商行业，从各种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到金融高利贷中的钱庄、票号、银炉、当铺，从行商、坐贾到经纪、牙行，都有各自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经营传统。它们各自保有的传统业务和经营方式，只有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发生了它们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它们的传统经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面临着阵地日益缩小的前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和西方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相反，不少行业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后，发现自己原来的传统业务和经营很容易转向适应入侵者的需要的轨道，从而有可能相应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一天一天地走上为侵略者服务的道路。

交通运输业中的海运和银钱金融业中的钱庄，就是代表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的典型。

中国的沿海贸易和运输，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交通运输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海运的大小帆船，散布在沿海各口岸，数以千计。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他们原来经营的沿海贸易和运输，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干扰。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入侵者向北部的扩张及其对沿海转运贸易的非法攫取，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40年代中期，当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大规模插手中国沿海转运贸易的时

候，经营传统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已经开始感受到侵略势力的威胁。在福建沿海，不论是已开口岸的福州、厦门，还是并未对外开放的口岸，都充斥着专门转运中国货物的外国划艇。^①当时有人说：厦门开埠以后，闽省即“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②，这虽然不是专指中国货物之转运而言，但中国沿海帆船业者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概见的。

进入 50 年代后期，当轮船日益取代帆船的运输以后，这种威胁给人们以更加明显的感受。《天津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上海以北 1500 英里的沿海贸易，把中国大部分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商船的手里。南方的福州是这样：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福州运往中国其他口岸的货物，已有 1/3 改由外国轮船载运。^③由其他口岸进入福州的中国商船，则减去不止一半。^④北方的牛庄也是这样：在开埠以后的 1862 年，牛庄进口的外国商船，包括轮船和帆船在内，一共是 86 只，27000 多吨；3 年以后（1865），激增至 274 只，91000 多吨。^⑤与此相对照，60 年代下半期，来到牛庄的中国沙船减少 1/3 以上。^⑥所有这些，都是 60 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帆船运输业面临严峻局面的缩影。

和航运业中的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业中的钱庄。

① S.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以下简称 Wright), 1950 年版, 第 203 页。

② 邵循正：《1845 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见《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以下简称 Commercial Reports), 1865—1866, 福州，第 40 页。

④ 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英桂奏，清代钞档。经济研究所藏。

⑤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以下简称 Trade Reports), 1865 年，牛庄，第 13—14 页。

⑥ *Commercial Reports*. 1869—1870, 牛庄，第 94 页。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信贷机构之一。它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分布也比较广泛。钱庄或钱铺的名称，在明代的小说、笔记中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上海，至迟在 18 世纪中叶，钱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它所签发的即期和远期庄票，有很高的信用，得到商业界的普遍接受，给商人调度资金、融通信用以很大的便利。在福州，当这个商埠对外开放时，西方的人侵者发现整个市上的钱庄达到百家之多。^①一般大宗交易的媒介，基本上是当地银钱业发行的票据。^②宁波的钱庄，很早就实行了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凡与钱庄有往来的商人，成交买卖，只需在钱庄过账，互相抵划，不必过手现银。^③在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城中，钱庄发行的钱票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钱庄在调节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钱庄的这种作用适应了西方国家推销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需要，因而很快地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注意和被其利用。

以上海的钱庄为例，在开埠不久的 40 年代中期，刚刚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就注意到钱庄庄票这样一个方便的支付手段而开始加以利用。进入 50 年代以后，庄票已经比较普遍地被外国洋行接受，作为结算的工具。许多经纪对外贸易的掮客，都以资力比较雄厚的钱庄所签发的 10 天或 20 天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④。这时如果钱庄拒绝提供例行的方便，外国商人的货物就难

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pp. 20—21.

② R.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1935 年版，第 243 页。

③ 戴枚等：《鄞县志》第 2 卷，1874 年版，第 6 页；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1960 年版，第 122 页。

④ North China Herald (以下简称 Herald)，1858 年 6 月 12 日，第 182 页。

以成交，中国的经纪和掮客也将束手无策^①，到了60年代，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场合更加普遍。有些洋行在招揽生意的广告中，公开宣称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②。如果说，50年代还只有大钱庄的庄票具有合格的支付能力，那么，到了60年代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大小钱庄。对外国商人来说，那时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进货要能销出更多的货物。^③

随着钱庄与外国洋行联系的加深，钱庄的资金来源、营业对象和业务范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钱庄周转的对象是沙船上的国内土产，那么，现在则转向出口丝、茶，进口棉纺织品和鸦片；如果说，以前和钱庄打交道的主要是沙船业主和其他旧式商人，那么，现在就新添了为洋行接洽生意的买办、经纪和掮客；如果说，以前投资钱庄的人物主要是中国的旧式商人，那么，如今在他们之外，又出现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和各种各样的买办化商人。一句话，在钱庄身上，除了原来的封建社会加给它的烙印以外，又开始加上了一层殖民地的色彩。^④

出现于航运和金融业中的不同情况，在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中

①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2—1854. 1953. p. 403. S. C. Lockwood,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1858—1862. 1971. p. 130.

② *Herald*, 1862年3月1日，第34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 1869—1871，汉口，第192页。

④ 当然，也要看到通商口岸和内地钱庄的区别。且不说偏僻内地和上海的巨大反差，就拿北京和上海比较，钱庄和外国银行的关系，也不一样。一直到1885年，汇丰银行提出在北京设立一代理行，由于选址是在北京钱庄集中之区，遭到钱号的反对。结果汇丰只得迁移到使馆附近，从天主教堂租得一区之地，方始平息。而在此以前，怡和洋行也有此计划，但不敢明设，而是冒用同裕隆（Tung Yuen Lung）钱号的名称。参阅 F.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1，第525页。

也同样存在。总起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从入侵者这一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障碍固然要加以打击和扫除，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的，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和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二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 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

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引起的外中商人关系的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中外商人关系的种种表现，决定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一般地说，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对入侵的资本主义采取抵制禁拒的态度；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需要的，则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一个总的趋势。

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同一行业之中，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的际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例如，同属旧式金融业，重点在北方和内陆的山西票号和重点在通商口岸的上海钱庄，它们的际遇就不一样。当钱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转入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票

号却走上结纳权贵为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在它的汇兑业务中，京饷、协饷等官款的汇解，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虽然参与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汇兑，但一般不和外国洋行发生直接的金融联系。同样，中国封建社会中专营经纪的牙行，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一部分遭到淘汰，一部分则适应外国入侵者掠夺原料、推销成品的需要，作为中间媒介，成为压榨小生产者、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工具。60年代通商口岸一些华商栈号用来与外国洋行打交道的掮客，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经营牙行的经纪老手。^①

在说明这种分野的问题上，中国的大豆转运贸易和大豆的加工生产，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我国东北主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从两方面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注意：一是大豆的沿海转运贸易，一是大豆的加工生产。

被称为豆石的大豆沿海转运贸易，是中国传统的沿海转运贸易的大宗，也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帆船业者和运输工人赖以生存的传统行业。当60年代初期外国轮船侵入豆石转运贸易之时，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豆石贸易的参加者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进行抵制的大量事实。上海从事豆石转运贸易的沙船业者首先起来反对，甚至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沙船利益的保全。^②而牛庄、登州两处的大豆商人，也利用行会的势力，对大豆的贸易条件和价格结构，进行全力的控制，力图把这一传统贸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 (以下简称 Daily News.), 1867年3月23日，第272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32卷，同治朝，1930年版，第20—21页；Wright，第403—404页。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活动。

还在豆石转运贸易全面对外开放以前，在原有的中国商人中间，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走上了另外的方向。他们不是对抗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而是使自己的活动适应入侵者的需要。当外国商人在登州一带进行非法的豆石走私的时候，那里就出现了中国商人的配合活动。这种走私，常常是由中国商人出面，在登州运载豆石出海，然后在口岸辖区以外的海上，将豆石转交给走私的外国轮船，从中分享走私的利益。^① 在这里，中国商人实际上是外国非法走私的从犯，而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利用外国轮船运输的优越条件，以达到获取优厚利润的目的。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当豆石贸易完全对外开放以后，在外国船只航行速度和吨位运费远较中国帆船优越的条件下，中国沿海的豆石转运贸易，会愈来愈多地为外国商船所掌握。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以豆石贸易最大的口岸牛庄为例，在开关以后的三年中，进口的外国船只由 86 艘增加到 274 艘。其中绝大部分是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沿海转运贸易。例如，在 1865 年进口的外国船只中，由中国商人租雇的，几占 90%。^② 与此对照，原来有两千余号以运载豆石为专业的沙船，此时只剩下四五百号。^③ 所有这些，都是在上海沙船业者向清政府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保全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

出现在豆石转运贸易中的情况，同样存在于豆油豆饼的加工生产中。

① B. Dea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1860—1846, 1974 年版，第 82—83 页。

② Trade Reports, 1865 年，牛庄，第 14 页。

③ 《海防档》，1957 年版，购买炮舰，第 861 页。